

政府遷臺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

口述座談 我的1949

鄭坤騰*

口述歷史



林滿紅館長主持「我的1949」口述座談

劉樹斌攝

壹、前言

1949年象徵一個變動的年代，同時也是流徙的年代。隨著國軍在內戰中的節節敗退，上百萬不願意接受共產黨統治的人民開始了他們長達數月甚至經年的顛沛流離。對國民黨領導階層而言，戰爭失敗的代價是山河易幟，但對這群遷徙的群眾而言，更多的感受卻是生離死別，而臺灣則是這趟苦難之旅的終點以及新希望的開端。作為一個歷史的集

體記憶，1949年代表的不僅是一個重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更是眾多等待記錄的生命史歷程。基於這項理念，六十年後的今天（2009年12月8日），「政府遷臺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特別安排「我的1949」口述座談，由國史館林滿紅館長親自主持，邀請到三位聲譽卓著、著作等身的史學大家，從個人生命史出發，就其歷史家的視野，暢談「我的1949」。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本次邀請參與口述的學者分別是張玉法、閻沁恆及陳存恭等三位教授。張玉法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36年生於山東省，因國共內戰隨校南下，輾轉流亡至澎湖，為「七一三事件」的見證人。自臺灣師範大學史地系、政治大學新聞所畢業後，赴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攻讀歷史學碩士學位，學成歸國任職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研中國近現代史，其《中國現代史》等著作已為各大專院校研習近現代史必讀之教科書。

閻沁恆教授，1932年出生於山西省，1948年隨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流亡南京、廣東南海等地，1949年8月隨校遷至臺灣，在流亡失學一年之後，終獲安頓。閻教授從臺灣大學歷史系及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之後，赴美西拉鳩斯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新聞傳播學院及英國南安普頓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歷史系繼續深造。回國後歷任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主任、歷史學研究所首任所長，以及政治大學訓導長、傳播學院院長等職，著有《漢代民意的形成及其對政治之影響》、《大眾傳播學研究方法》等。

陳存恭教授，1933年出生於福建，1948年來臺求學，考取臺東師範學校

普通師範科第一屆，為國民政府遷臺前對臺灣苦心經營及古寧頭、登步島兩次大捷的時代見證人。陳教授畢業於師範大學史地系，進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為國史、區域史及軍事史研究重要學者，退休後擔任近史所兼任研究員，專著有《列強對中國的軍火禁運，民國八年—十八年》。

貳、國史館林滿紅館長致詞

這一次「政府遷臺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除了學術論文發表外，我們也透過影片、展覽及圓桌座談的方式來描述及瞭解國家領導人遷臺的整個歷程。現在是民主時代，帝王時代的國史主要集中討論國家領導人的歷史，但在民主時代，我們尚須將眼光移到一般人民身上。

今天參與口述座談的張玉法老師、閻沁恆老師和陳存恭老師三位都是國內知名的歷史學者，張玉法老師的著作是研習中華民國史必備的教科書；閻沁恆老師長年在政治大學歷史系執教；陳存恭老師是近史所的軍事史專家，軍事史屬於國史館重點研究項目之一，所以他與國史館也有很多的往來。在座三位學者都是1949年前後來臺，他們原籍分別

是山東、山西和福建省，來臺灣的年紀各自是14歲、17歲和16歲。今天有一位年長的與會來賓提到，1949年已經過去60年，不但年輕的三、四十歲學者無法體會他們那一代的遭遇，可能連五、六十歲的人都不能完全瞭解，所以我們要讓七、八十歲的人自己說話，但我們要特別小心，60年的歷史記憶可能隨著時間一直順流而下，只怕是欲罷不能。

關於口述學者的選擇，我們完全是隨機抽樣，沒有特別的設計。討論的主題包括為什麼到臺灣來？到臺灣的歷程，例如坐了什麼交通工具？到臺灣之後，對臺灣的印象如何？對1949年有何特殊感受等？

現在請三位老師談談「我的1949」。

叁、張玉法院士口述「我的1949」

一、到遠離戰爭的地方

時間過得非常快，我的研究領域是近代史，研究了幾十年，突然之間，我卻變成人家研究的對象，自己變成歷史了。

其實在座的我們三位在1949年時年紀都還很小，大不了才剛上中學，所以

我剛才告訴林館長，這場可以稱作兒童史。為什麼我選擇來臺灣？我的家鄉是在山東省嶧縣，大家也許沒聽過嶧縣，但嶧縣境內的台兒莊卻是耳熟能詳，我就出生在台兒莊附近的小鎮。我家裡的田地大約只有一頃多，屬於小地主家庭，但一頃多的田地在地就已經算是很有錢。1947年，抗戰勝利不久，國軍還沒到達，共產黨就先來了，來了之後就鬥爭地主；我見過鬥爭，我父親站在一張桌子上，佃農們公開批評他，分我們的田地、糧食，隨後共產黨幹部還將我父親關起來。後來我父親逃走了，我們三個兄弟，也跟著逃走。國軍從徐州反攻，把共產黨打跑之後，我們才又回到家鄉。

共產黨第一次來的時候，我們是逃犯，所以等到共產黨再來時，我們一定要逃走，至於要逃到哪裡則不知道。那年是1948年的暑假，我二哥剛好小學畢業，我當時才小學五年級。縣立中學原本位在縣城，但由於縣城已被共產黨攻下，所以縣中遷到本鎮附近招生，我二哥和我一起參加考試，我是以同等學力的身分報考，最後兩人都錄取了。錄取之後，我們的校長集合大家講話，他說：「我要帶你們到遠離戰爭的地方，到南方去！那邊沒有打仗，我們到那邊

讀書！」聽到校長要帶我們逃走，我的父親非常贊成，因為他也要逃走，不逃走的話，共產黨來了就會捉他。在校長的帶領下，我們提前離開了故鄉。

二、從徐州到郴縣

我是在1948年農曆的9月9日從台兒莊附近的小鎮出發，由校長及老師帶領三百多位初中學生，每一人帶一個背包，行李包括棉被、個人衣物、書、小板凳和一個圖板，圖板是上課時用的。大家的行李都很簡單，一開始先用走路，走了十幾公里到達徐州外圍的賈汪，再從賈汪搭乘運煤車到徐州。

到達徐州後，我們暫住在徐州的銅山中學，因為銅山中學的學生白天要上課，我們白天就在操場上課、吃飯，等他們放學之後，我們再搬到他們的教室去住。那時候的教室都是泥巴地，沒有水泥地，有很多灰塵和泥土，他們掃地之前都要先潑水，所以我們晚上就睡在潮濕的地上，北方9月的天氣已經很冷。

我們在徐州住了約兩個禮拜，共產黨的軍隊要包圍徐州，局勢比較緊張，我們決定離開徐州，坐火車南下，到了浦口，改搭渡輪到下關，從下關再搭京滬路的火車到鎮江。比較舒適的火車輪不到我們坐，都是坐運馬用的列車，車

廂是敞棚式的，上面毫無遮蓋。到了鎮江之後，又坐船到鎮江對岸的瓜州，離揚州很近。我記得我們住在瓜州的一座破廟裡面，飲水取自附近的運河，運河水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下游打水喝，不遠的上游卻在刷馬桶，所以很多同學都鬧腸胃病。

我們在瓜州只住了一個月的時間，由於徐蚌會戰戰況緊急，我們又再次逃走。這一次逃的比較遠，先離開瓜州坐船回鎮江，再坐火車到上海。到上海之後，我們找到一班專列，所謂專列就是專門運送流亡學生的火車，我們搭乘專列從上海到杭州，再從杭州坐浙贛線到株州，株州可以接平漢線，我們又搭平漢線南下過衡陽，目的地是湖南最南部的郴縣。郴縣有一個小火車站叫棲鳳渡，我們住在棲鳳渡附近的鄉下祠堂，祠堂是我們的寢室也是教室，白天在那邊上課，晚上在那邊睡覺，還要另外撥時間上山打柴。一開始湖南省政府還會撥一些米和煤給我們生活，但撥配的地點都很遠，要我們自己去扛，男生每天要走十幾公里的路，從早上走到晚上才能回來，但至少當時地方政府還會撥一點糧和煤給我們，等到共產黨渡江之後，就沒人管我們了，也沒有人給我們飯吃。在鄉下沒飯吃很麻煩，所以大家

只好一起當乞丐，到處要飯。在座各位可能都沒有行乞的經驗，作乞丐最怕的事情第一是狗；第二，老百姓的剩菜剩飯有時候都已經餿壞，但還是照樣打給我們吃，有時吃了就肚子痛、嘔吐。

三、從廣州到澎湖

我們在湖南住到1949年6月，當時共產黨的軍隊已經渡江，上海失守，我們只好再次逃亡。這一次的目的是廣州，坐火車不像以前還有專列，當時的火車班次已經很少，而且只要是從北邊南下的火車，每個車廂都擠到幾乎無法上車的地步，最後我們只好爬到火車頂端，全體同學都坐在車廂上面。很多流亡的故事都提過，火車到韶關的時候會經過一座大山洞，火車一過山洞，有些同學坐在前列，一不注意就被山洞刮下去，我們是坐在中間及後段，一聽到前面同學被刮下去了，就趕緊伏下身來，因此得免於難。

我們到廣州之後是住在廣州中山堂廊簷下方，中山堂裡面由長白師範的師生佔住，後來我們又從中山堂搬到五三小學。到廣州之後，因為兵荒馬亂，已經無法上課。我記得當時每天只發給我們2毛錢港幣，能吃兩個燒餅就不錯了，根本沒錢吃飯，幸虧當時廣東經濟情況

還不錯，有很多慈善機構做好飯之後，就一桶一桶的擺在街上，我們可以去吃。特別的是，廣東還有一些人專門到大飯店去收剩菜，將剩菜直接倒到大桶裡面，也放在街邊給人家吃，因為看起來很可口，我們都會去吃，吃了一段時間，聽說廣東人喜歡吃「龍虎鬥」，也就是蛇跟貓一起煮，之後我們就不敢吃了。

不管如何，流亡期間，什麼樣的飯菜我們都吃過，幸好沒有餓死。到廣州住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也不知何去何從。當時臺灣已經戒嚴，不准隨便入境，大家對未來都很茫然，有一批同學說政府可能會守四川，建議我們到四川去。就我的印象，有好幾十位同學結隊去了四川，但這些去四川的同學從此就沒有下落。大陸開放之後，我們曾回家鄉打聽，發現這批人統統沒有回到家鄉。

在廣東期間，我們有兩位同鄉在軍中當大官，對我們這群山東流亡學生還滿照顧的，一位是1949年才從青島撤退出來的劉安祺將軍，他在青島原任十一綏靖區司令官，撤退之後到海南島，改任二十一兵團司令官，統轄兩個軍。他撤退到海南島之後聽說山東有七、八千名流亡學生流落在廣州，沒有



張玉法院士

劉樹斌攝

地方去，為表示歡迎，他說：「如果你們願意來，由我來安排交通工具。」除了這位同鄉想方設法照顧我們之外，另外一位同鄉則是山東省主席秦德純。秦德純當時兼任國防部副部長，可以和高層尤其是時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的陳誠講上話，他告訴陳誠，山東有這麼一批子弟流落在廣東，請陳誠想辦法把他們接到臺灣來。陳誠問他：「你想把他們送到哪裡去？」他說：「有一位山東同鄉擔任澎湖防守司令部司令，他願意照顧這批學生；這批學生可以接到澎湖去。」陳誠聽他這麼說，就特許我們到澎湖。當時臺灣當局對流亡人士入境管制很嚴，因為擔心擾亂臺灣秩序，所以不輕易放人進來。澎湖防守司令官李

振清為此派了兩艘船，先後將我們接到澎湖，其中有一艘船中途在臺灣海峽起火，起火之後，船長原本打算棄船自己逃離，當時我們的校長有手槍，用槍指著他，要他救這艘船，最後他才打消棄船的念頭，勉強將船修復，終於把我們安全送到澎湖，但這艘船在回程廣州途中終究還是沉沒了。

四、「七一三事件」

山東各地的流亡學生南下之後，教育部為我們成立了八所國立中學，總稱濟南國立聯合中學，我是屬於第四聯合中學。我們聯合中學的學生都住在澎湖防守司令部營舍裡面，剛到的時候，我們發現女生和老師統統不見了，到營舍

的都是男生，防守司令部把我們統統編組成兵，還派了班長，全部都住在營房裡面。

當時軍方答應把我們從廣州接到澎湖有一個先決條件，軍方要求17歲以上的同學到了澎湖之後，必須一面受軍訓，一面上課，一直到高中畢業為止，高中畢業之後，可以自行選擇考軍校或考大學，如果兩邊都考不上，就繼續當兵。至於17歲以下的學生以及女生，統統會成立學校，讓他們繼續唸書和升學。但我們這些男生無論大小，到了澎湖統統被編了兵。

當時同學組有自治會，7月12日晚上，自治會幹事偷偷告訴我們：明天一早吃過早飯之後，大家直接到大操場司令台集合，我們要一起走出去；我們渡海到澎湖不是為了當兵，我們的身分是學生，希望能繼續唸書。為了爭取權益，我們要走出去表示抗議。

翌日，也就是7月13日一早，我們吃過早飯就統統自動跑到大操場集合，準備走出司令部。當時軍方事先得知消息，司令部大門口已經被軍方封鎖，就我的印象，至少有兩、三挺輕機槍對著大操場，瞄準我們。大概有幾十個士兵在門口站崗，全部都上刺刀，周圍的圍

牆也統統站滿了士兵，槍口全部對準大操場，把我們當作目標。雖然我們還是想繼續往外衝，但想衝也衝不出去，因為他們的刺刀全部對準我們。雙方僵持了很久，後來指揮官叫我們不要衝動，司令官要過來和我們講話，要我們到司令台前集合。我們聽到司令官要來，都以為得救了，因為司令官是我們的同鄉，總不會對我們不利，所以我們就乖乖的在司令台前集合，沒想到這位同鄉一上台就把我們大罵一頓，我們有話也無法說。自治會的幹事李樹民舉手說：「報告司令官，我有意見！」司令官說：「有意見到前面來講！」李樹民真的往前走，還沒走到司令台，我就看到士兵拿著刺刀往他胸口刺，他及時轉身，刺刀刺中他的臂部，當場血流如注，這位同學只好跪下來大喊：「司令官饒命！」另一位自治會幹事也要表示意見，結果被刺到臀部。

我們那時候都還只是初中的孩子，沒碰過這種場合，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放聲大哭，完全無計可施。司令官的用意應該是殺雞儆猴，看到已經達到震懾的效果，開始好言相慰，又將兩位受傷同學送到醫務室包紮。這件事情過去之後，指揮官叫我們按照高矮次序排隊，個子高的當兵，矮的就送到學校。

我們只能乖乖排隊，那時候我個子比較矮，排在後三分之一的地方。我有一個本家哥哥，我跟他說：「我們就站在一起，你站哪裡，我就站在哪裡。」但因為他個子比較高，人也比較聰明，他說：「你小孩子跟著站在這裡幹什麼？你到後面去排隊！」說完就把我往後排推了兩、三個人次，指揮官來了之後，要我們站好不要亂動，最後我就站在那裡。隊伍排好之後，指揮官宣布從我前面兩人開始向右轉起步走，他們全部繼續當兵；我這邊則是向左轉，分配就學。想起來真是千鈞一髮，機會也不知道怎麼來的？離開司令部之後，我就被編到子弟學校讀書。

我們到了子弟學校之後，軍方還是不放棄要我們當兵的念頭，一開始是採取飢餓政策，所謂飢餓政策就是不給我們飯吃，一天僅送一頓飯，而且在下午三、四點才送來，用大汽油桶裝著南瓜糙米稀飯，有很多同學搶不到，有時候甚至還把大桶搶翻了。因為不給我們飯吃，有些同學只好自己去海邊捉螃蟹等來充飢，當時秋收已經過了，我們也會到田地裡翻找一些農家收穫時遺漏的花生、地瓜，只要是能吃的，都盡量蒐羅來吃。很多同學因為餓怕了，最後還是屈服，又跑回去當兵。後來軍方認為

這個手段還不夠，想方設法的把我們捉回去當兵，無所不用其極。當時大家都是蹲在大操場吃飯，到開飯的時間，軍方又派人來挑，看到哪些人的個子高一點，就騙他們說：「你們的學長都在出操，非常辛苦，你們應該去幫他們洗洗衣服或作作飯。」然後趁機將他們帶走，害得很多個子稍微大一點的同學都不敢來吃飯。

澎湖防守司令部刺傷同學、強迫編兵這件事發生時，在澎湖還有兩位聯中校長，一位是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一位是煙台聯中第二分校校長鄒鑑，他們兩位想盡辦法將消息傳到臺灣本島，指控軍方把小孩子強迫編兵。當時山東省政府還在臺北，兩位校長將這件事告訴山東省教育廳長徐軼千和省長秦德純，以及許多山東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大家聽到山東的子弟在澎湖受到那麼大的委屈，都非常關心。最後決定由山東省教育廳長徐軼千會同國防部官員到澎湖來一看究竟，徐軼千到了澎湖之後，要求防守司令李振清將這些編兵同學重新排隊，由視察諸人來評判這些同學到底適不適合當兵，至少要能拿動槍才能當兵，排隊之後，由他們挑出一些人來帶回學校。

軍方的指揮官也很聰明，雖然他

們不敢拒絕讓同學重新排隊，但他們已經事先將一些個子比較矮的同學帶去海邊玩，出來排隊的人當中，個子矮的已經不多。不管怎麼樣，校長和教育廳長還是盡量鼓勵一些不該被編兵的同學出列。這些小孩子一開始不敢出列，擔心出來之後會受軍人的迫害，張敏之校長動之以情，請他們一定要出來，後來才勉強挑出六十多人。

救出六十多人之後，張敏之校長還是不死心，抱著救一個算一個的心理，想盡辦法要把同學救出來，從這點我們可以看到一位教育家是如何愛護學生。這些軍人的目的就是想增加兵源，也不管這些學生能不能勝任軍中任務。我們對張敏之校長非常感念，張校長想盡辦法要維護學生的權益，因為他始終不放棄，澎湖軍方就製造了一件匪諜案，說他們是共產黨南下工作團的人，羅織罪名逮捕張敏之、鄒鑑兩位校長，還捉了煙台聯中一百多名同學，嚴刑逼供，統統屈打成招，最後兩位校長和五名同學被槍斃於臺北市馬場町。雖然這件事已經獲得政治平反，但回想起來，仍然相當讓人難以接受。

五、抵臺

經過軍方鎮壓之後，大家已經不敢

輕舉妄動，當兵的就乖乖當兵，讀書的更是噤若寒蟬。到1953年的寒假，當時李振清司令官要調職，新任司令官不是山東人，他才不管我們這些山東子弟，我們一時也不知該怎麼辦。那時候臺北市有一個山東同鄉會，同鄉會在青島撤退時運了一批漁業物資出來，他們變賣漁業物資之後得到一筆錢，利用這筆錢幫我們在彰化員林找了一間校舍。另外，劉安祺將軍當時擔任臺灣中部防衛司令官，他派了一個兵工營幫我們搭建校舍，所以這完全靠同鄉關係。

我們在1953年來到了員林，一開始到員林的時候，學校改為「國立員林實驗中學」，國立屬於教育部，是教育部唯一管轄的中學，但那時候教育部財源相當匱乏，經費的三分之二都被我們學校佔去，他們連辦公費都沒有，而我們也幾近斷炊，吃了半年的地瓜稀飯。在無以為繼之下，教育部將學校改為「省立員林實驗中學」，因為臺灣省政府比較有預算，我們也就有飯可以吃了。

肆、閻沁恆教授口述「我的1949」

一、隨「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遷校

我是山西省人，1948年2月，在槍林彈雨中，我從山西太原搭乘民航機先至北京，再到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報到。這個學校所有學生的身分都是父兄在抗戰期間戰死的子弟，學校在復學以後差不多有六百多位學生，多數同學來自山東、湖南，因為國軍部隊當中，這兩省的軍人佔絕對多數。到了1949年2月間，南京政府機關和國軍主力部隊已經開始撤退，市內、郊區交通大亂，學校的工人也開始搶奪學校財產，老師們大部分都已離開，只有校務主任被工人軟禁起來，我們首先把校務主任救出來，然後再籌劃從南京到杭州，杭州到南昌、衡陽，最後到廣東南海縣，在廣東一住就是四、五個月。

1949年，我們學校遷校路線大致和張玉法院士當年走的路線相同，先從南京坐卡車出發到杭州，然後坐火車經過南昌、湖南，最後到廣東。一路上交通資訊都非常紊亂，昨天我們有看到「存亡關頭——1949年的中華民國」紀錄片裡面的歷史鏡頭，在影片中，火車頂上是坐滿了逃亡人潮，剛才張院士也曾提到這件事。除了貨車的貨艙坐滿了人，客車的車頂上也坐滿了人，火車裡外滿滿的都是人。我們學校是集體行動，鐵路當局經常會撥出幾列車廂給我們，為

了同學安全，遂禁止同學坐到車頂，一行人都擠在車廂裡面，擁擠到連行李架上都有睡人，從地板到座位擠得毫無空隙，晚上睡覺真的是不能翻身，整座車廂水洩不通。白天還可以到車廂外面走動，晚上只能擠在一起。火車的行車時刻隨時在變化，說停就停，說走就走，從湖南到廣東這麼短的路程，卻走了將近十天左右才抵達廣州。

抵達廣州之後，我們暫時定居在南海縣。在當地，和張院士一樣，我們也是借住在民間祠堂。不同的是，我們不能上課，因為我們的老師都已回家鄉，跟隨我們的只有校務主任和其眷屬。無論是杭州還是廣州，將近七、八個月的時間，我們都沒有上過一堂課，白天得設法打發時間，年紀大一點的同學還可以打麻將消遣，我自己在初一的時候因為賭博被學校留校察看，從此以後，我這幾十年來都沒再碰賭博。大家白天無所事事，只能打麻將、聊天或游泳等，利用各種活動消磨時間。在南海縣的四、五個月期間，因為無聊，有些同學白天會去河裡游泳，但我們根本不清楚何時漲潮、退潮，兼之河裡又有漩渦，因此不小心被淹死的同學就有七、八位。



閻沁恆教授

劉樹斌攝

二、抵臺 重回校園

我們在南京的時候，和政大分部是鄰居，他們在孝陵衛，我們在中山陵區；到廣東之後，政治大學也遷到南海縣，我們又成了鄰居。在1949年7月底，我們聽說政治大學要重新遷回重慶小溫泉校區，於是我們也察覺到時局又有重大變化，經過討論之後，覺得遺族學校恐怕也要跟著開始移動。除了四川之外，另一個選擇就是臺灣，我們從小就知道臺灣不只是美麗的寶島，而且生產品質最佳的糖和最好吃的香蕉。經過幾個晚上的開會討論，藉由公決，在四川和臺灣之間，我們決定不去四川，選擇了臺灣，因為臺灣太好玩了。幸好最後的選擇是臺灣，如果選擇四川，恐怕就

和張院士的幾位山東同學一樣，從此消失。後來政大遷到重慶，再轉遷成都，其中有幾百位同學從軍，大部分都犧牲於川西戰役，只有很少數得以輾轉來到臺灣。

在7月底決定到臺灣之後，我們開始和廣州政府當局交涉，比起其他學校，遺族學校能受到比較好的照顧，因為我們的校長是蔣中正總統，校董會主席是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打著他們兩位的招牌，辦事也比較方便，交涉之後，廣州當局決定讓我們坐船到臺灣。那時候全校師生加上一小部分眷屬，人數大約400人左右，我們先從南海縣坐船到黃埔軍校校地，當時戰事相當緊急，對方已經打到廣東北部，黃埔校內空無一人，全

部都是空屋，我們師生就在那裡住了幾天，等候要到臺灣的船。

1949年8月2日，我們終於等到船隻，全體同學一起上船，這艘船名喚「金剛輪」，它的載重量大概是3千噸，原本是一艘貨船，但載運的全是人，船上擁擠的程度可說是毫無空隙，甲板上、船艙裡，到處擠得滿滿的，但為了逃難，大家也只能冒險，忍耐船上的擁擠。從黃埔出發，出了粵江口，經過香港海域，遠遠可以望到香港的燈火。8月3日，我們抵達基隆港，當時臺灣的出入境管制非常嚴格，雖然我們已向政府報備，但還是要經過嚴格審查。船到基隆港，人員不能下船，要等到我們將全部名冊、人數重新清點，交給警備當局，然後經他們逐一核對，確認無誤為止，一直到晚上才獲准下船。

下船之後，我們坐火車來到臺北市，暫時被安置在大橋國民小學，借住學校的七、八間教室。我們在小學大概住了三個多月，一直到1949年年底，政府才幫我們找到安置學校，也就是「臺灣省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即現在的師大附中。我們被安置在那裡，借住的是他們的體育館，這是一座可以容納三、四百人的木造體育館，我們自修和吃飯的地方是學校禮堂，學校也沒有多餘的

設備可供三百多人使用。在附中，我們等候了一個多月，一直到下學期開學，流浪、失學一年的我們終於回到教室，由老師按部就班的上課，同學們心裡的感受都很深刻，可以在臺灣那麼好和安定的學校環境繼續求學，大家真的非常高興。

三、美援藥物的即時到來

在1950年的某日，我們接獲通知，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蒞校談話，我們集合之後，她告訴我們：「你們父兄都是為國家捐軀的烈士，你們受到國家的照顧，不能僅享受父兄的餘蔭，你們自己也要報效國家。」她的指示有兩個重點，第一，所有身體合格的同學都應該從軍或者投考軍校；第二，如果年紀還太小，或者身體不合格的同学，就準備投考師範學校、農業職業學校或工業職業學校。她說：「從一般高中升大學是一般家庭子弟所安排的人生規劃，以你們的身分，國家對你們的期望遠高於一般家庭，所以你們一定要提早從軍報國，效法父兄的遺志。假設健康達不到軍校標準，可以去考師範或職業教育學校，提早貢獻社會。」聽了蔣夫人的一番勉勵，三百多位同學多半都選擇從軍，有一些身體不夠格的，就改考師範或職業學校。

以我自己為例，我從小就是個病號，到哪裡都生病，不生病的時間很少。1949年年底到1950年期間，我罹患了一種怪病，從膝蓋以下到腳趾持續的神經痛，痛到晚上無法成眠，連續四、五個月下來，我的體重已經降到三十來公斤，骨瘦如柴，整個身體輕飄飄的，所有醫院都跑遍了，還是查不出原因。直到有一天，美援藥物隨美援物資來了，學校校醫告訴我：「閻同學，反正你的病也治不好，這次美援物資當中，我們學校有分到一些維他命丸，既然你身體那麼差，我多給你一點，你就每天吃。」吃了三天之後，我感覺到有效果，晚上終於可以睡覺，一週之後，疾病就不藥而癒。三百多位同學之中，我是第一位罹患這種病的人，以後還陸續發現很多同學得到這種病，但他們的運氣比較好，有我這個先例，我差點為此送了命，由於我的實驗成功了，所以他們就不必再受到病魔的折磨。昨天看了美援藥品來臺的論文，讓我想起我這條小命是美國維他命救回來的。

伍、陳存恭教授口述「我的1949」

一、與臺灣的淵源

我於1933年生福建省南安縣一個

小康之家，5歲時中日全面戰爭已爆發，6歲啟蒙讀小學，可說從小就在抗日氣氛濃厚的環境下長大。記得我在朗誦剛學過的課文「臺灣糖，甜津津，甜在口裡痛在心」時，我父親聽了，對我講述我家與臺灣的一段因緣。原來我祖父曾到臺灣經商，甲午戰爭前娶了臺灣小姐為妻，生下我父親和叔叔，甲午戰爭戰敗割讓臺灣，祖父攜妻兒回到南安故鄉。所以我家與臺灣的關係很密切，八年抗戰勝利後收回臺灣真是大快人心。1947年，臺東師範學校約聘我的堂兄擔任人事管理員，家裡無人反對，不料就在這年，我祖父因病去世了。

二、到臺灣求學

1948年，我初中畢業，繼母反對我繼續升高中，認為我是獨子，應該在家管理家產。最主張讓我讀書的祖父已去世，沒人支持我升學，幸而堂兄知道我喜歡讀書，便專程回家，說服我的父親，讓他帶我到臺灣就學。所以我來到臺灣的時間是1948年，目的是為了唸書，不是逃難。當時國共在東北爭奪長春，但福建很平靜，大家都沒料到後來情勢會逆轉，國民黨會失去大陸。

堂兄是普通公務員，當然無力支持我升學，他建議我投考臺東師範，公費



陳存恭教授

劉樹斌攝

待遇，修業三年，畢業後可以回家鄉當小學教員。在差點失學的情況下，當時真的胸無大志，只想謀一個可以糊口的職位，苟全性命於亂世。

我和堂兄在8月中旬離開故鄉，祖母特別交代我們找機會到她的故鄉去探親，她家住在鹿港的海波厝竹圍內，推測我的舅公應該還健在。我倆經過泉州到廈門住了兩天，然後搭帆船「億城號」到臺灣。當天天氣不好，下午上船，乘夜開航，臺灣海峽風浪很大，因船噸位不高，顛簸得很厲害，我有點暈船反胃，還好第二天早上到了安平，經小運河到臺南下船。堂兄帶我搭火車到林邊，換搭汽車由南迴公路抵達臺東。

當時的臺東是臺灣東邊的一個小市鎮，相當純樸、安靜，很適合唸書。我順利考取臺東師範學校普通師範科第一屆，過了四個月之後，就是1949年。師範三年的學生生活很單純，我因幾乎失學，所以更珍視眼前得來不易的上進機會，無論上課或自修時間都很認真，所以成績不錯。不過從1948年秋天開始一直到1950年春天是大陸迅速變色的年代，隨著東北戰事失利到徐蚌會戰的慘敗，1949年注定是兵敗如山倒的局面。該年1月天津失守，而北平與中共局部休戰，桂系主張與中共和談，逼得蔣中正總統引退，由李宗仁充任代總統，而與中共和平談判終於失敗，接著中共渡江

南下，國軍節節敗退，中央政府先遷廣州，再遷重慶，最後在12月由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宣布，中央政府遷到臺北。

三、金門古寧頭和登步島大捷

1949年這一年不斷的傳來壞消息，大家心裡都很難過。幸而國軍在年底打了兩次勝仗，即金門古寧頭大捷和登步島大捷。10月25日臺灣光復節凌晨，共軍九千人登陸古寧頭，次日共軍再遣一千餘人來援，我國軍奮起迎戰，殲敵三千餘，俘虜七千，大獲全勝。11月4日共軍八千登陸登步島，片甲不回。我們從報紙上看到戰役的經過，十分興奮。當年我這個17歲的學生不知道這兩次大捷的重要性，後來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後，有機會看到中共內部檢討的資料，才知道它的價值。指揮中共第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檢討攻金失利的理由，最重要的是沒有海軍、沒有空軍，又缺少渡海作戰的經驗。可見沒有制海、制空權不能進行島嶼攻防戰。毛澤東不打沒把握的仗，自此不敢遣軍進攻金門，只在1958年八二三戰役砲擊金門。金門和馬祖是臺灣的前線，能夠屹立堅守，臺灣更為安全了，這是古寧頭大捷穩定臺灣的理由。

四、長居臺灣

當年我們慶祝金門大捷，可是我想到共軍既已攻下廈門，又臨近金門，可見我的故鄉南安縣早就淪陷了，自此與父親失去聯絡，感到無限的悲戚。

總之，1949年是一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我能夠早一年離開故鄉，而且能夠在相當平靜的臺東唸書，真是有福氣。臺東師範的老師都很優秀，大多數是逃難來的，尤其是1949年這一年，許多老師從大陸輾轉來臺，他們的教學都很認真。這一年有5位山東流亡學生插班進來，大家都是有家歸不得，同病相憐，感情很好，本省同學也對我們很好，沒有什麼隔閡。

1950年3月，蔣中正復行視事，6月，韓戰爆發，美國宣布協防臺灣，自此臺灣更安全了。經過一甲子的歲月，臺灣無論在經濟、政治、教育各方面都有進步，人民大多數都能安居樂業，這是當年夢想不到的。我個人在臺灣六十一年間能夠不斷上進，能夠有好的職業，能夠成家立業，這都要感謝我的家庭以及國家、社會的栽培，感謝國軍捍衛臺灣，感謝老師的教育，感謝鼓勵我上進的長官，還要感謝改善我們生活的農工商大眾，我能有今日真是感恩不盡。

陸、林滿紅館長結語

以上三位學者口述的「我的1949」有兩個不同的角度，有純粹從大陸來臺的角度，也有從臺灣這邊看到的1949年。雖然是幾個生命的片段，但如果從生命史的角度，原本是根本活不下來的一群人，但最後卻得救了。這批山東流亡學生，高個子去當兵，矮個子去讀書，從此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我聽張院士私下向我透露，在李登輝總統時代，孫震先生擔任國防部長，國防部長是山東人，好幾位軍方司令也都來自這批流亡學生。而去讀書的人，玉法老師現在已經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生於憂患，他們是很好的生命楷模。這些故事除了有提升個人意志的作用之外，在歷史意義方面，即使是小小的片段，我們都可以從中看到潛藏的歷史訊息，例如維他命等美援物資的國際因素，在1949年之後如何進入臺灣的歷史發展當中。另外像剛才提到的「國立員林實驗中學」，在當時，省政府比中央政府還有錢，所以國立中學沒經費辦學，改成省立之後，學生才有飯吃。這其中隱含了很多歷史的訊息，我們很希望今後國史館可以配合全民，從更多角度來幫我們瞭解1949年這個關鍵的年代。

本館出版新書簡介

《從左到右六十年 曾永賢先生訪談錄》，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2009年12月出版。本書係前總統府資政曾永賢先生的口述訪談紀錄。內容包括其早歲負笈日本和返臺參與共產黨運動，被捕「自新」後於調查局任職並投入逾半世紀的中國問題研究與教學的過程，以及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資政、國家統一委員會研究委員、中華歐亞基金會執行長、副董事長任內的重要事蹟。尤其深入描述其思想由左轉右的特殊心路歷程，以及研究中國問題的獨到見解，對於兩岸關係有著發人深省的啟示。

《基督與召會 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卓遵宏、周琇環訪問，2009年12月出版。召會是一個富於本土化色彩，具有特別聚會崇拜形式的團體，其淵源萌芽自倪柝聲的異象啟示，政府遷臺後，則由李常受承繼傳布其教導，發揚光大其啟示，在短暫的五十年內，教會人數僅次於長老教會，成為臺灣基督教的第二大支派，且目前已推廣至全球五大洲35國，並傳回大陸地區，其影響既深且遠。李常受一生行誼實為政府遷臺後臺灣宗教發展史不可忽視的一環，故而出版本行誼訪談錄，將他對召會、國家、社會、世界的影響與貢獻翔實的記錄下來。